

古都南京与本土音乐的交互性探源

周 烨

(南京传媒学院音乐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赋予古都南京数量较多、内涵丰富、特色明显的本土音乐文化遗存。本文试图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选取南京白局、六合鲜花调为典型样本, 对比分析、探寻其与南京本土音乐的交互性, 为传统音乐文化(含非遗文化)的后续可持续发展寻求新的理论视野, 开拓新的传承思路。

关键词: 南京; 本土音乐; 交互性

南京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有着“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金陵是南京的古称, “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 金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历史上曾数次庇佑华夏之正朔, 是中国四大古都中未做过异族政权首都的古都, 被视为汉族的复兴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价值, 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衣冠南渡使汉族在金陵保存了华夏文化之正朔, 被历代所传诵。金陵是中国古典文化和风雅文化的代表城市, 象征着古典中华文明, 有“天下文枢”之称, 金陵和罗马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 金陵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为江苏省省会的南京拥有丰富的音乐文化遗存, 早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江苏卷》中均对南京本土音乐如南京白局、金陵琴派的古琴艺术、留左吹打乐、高淳民歌、南京评话等就加以过记载。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此后也成为了省级或国家级非遗。南京本土音乐, 顾名思义, 意指以古都南京为源地发展起来的传统音乐。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中对传统音乐的体裁分类, 目前学界仍沿用五分法居多, 即民歌(含古代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歌舞音乐。但是, “由于各民族传统歌舞音乐中的歌唱部分通常与民歌在体裁和曲目上重叠, 故而又形成了在原有五大类体裁分类基础上省略歌舞音乐的四大类体裁(即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分类法。”本文对南京本土音乐的描述仍将按照五大类体裁形式进行。南京本土音乐中涵盖了如南京白局、六合鲜花调等多体裁品种。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5年, 江苏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8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69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424项。其中, 含和南京本土音乐相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 如南京白局、古琴艺术(金陵琴派);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项, 如六合留左吹打乐、高淳民歌;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项, 如固城十番锣鼓、西善民歌等。它们中的绝大多数, 曾因悠久的历史、多彩的表演曲目而盛极一时, 但在经济快速增长及转型、城镇化不断推进的当下, 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本文试图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选取南京白局、六合鲜花调为典型样本, 对比分析、探寻其与南京本土音乐的交互性, 为传统音乐文化(含非遗文化)的后续可持续发展寻求新的理论视野,

开拓新的传承思路。

一、文化生态学的源起

1955年,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 斯图尔德在其代表作《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方法论》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 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主要是用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 认为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 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等, 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 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虽然斯图尔德为“文化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他的理论中极大关注了“环境对文化造成的影响, 至于文化的存在与运作如何对周围环境施加反作用, 被他在不经意间忽略了。”因此, 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后来的相关研究中, 人们对“文化生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认为文化生态还应包含社会环境, 即文化生态由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及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组成。近年来, 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被极大运用于旅游开发、非遗保护、民间音乐传承、中西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将传统音乐文化置于其所依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环境中进行多维考量, 能较系统且具创新性地认识文化兴衰的种种历史缘由。本文便试图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探寻、分析其与南京本土音乐(含非遗文化)的交互性, 为其后续可持续发展寻求崭新的理论视野。

二、南京文化生态与本土音乐的交互性

四大古都之一——南京, 古称金陵、建康, 位于长江下地区, 江苏省西南部, 属宁镇扬丘陵地区, 以低山缓岗为主。拥有秦淮河、金川河、玄武湖、莫愁湖、百家湖、石臼湖、固城湖、金牛湖等大小众多河流湖泊, 水域面积达11%以上。此外, 南京亦是长江下游唯一的跨江发展城市, 山川绿地资源丰富, 素有“龙蟠虎踞”之称。主城及周边由东向西有钟山、富贵、九华、鸡笼、五台和清凉诸山, 城北连接城西有栖霞、乌龙、幕府、狮子、四望、四明诸山, 以及城东连接城南的青龙、黄龙、雨花台、牛首、祖堂诸山。外围区域有六合北部平山、灵岩山等, 以及溧水东庐山、无想山等。天时地利造就了南京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均在此建都。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南京有着400多年的建都史, 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存, 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是南京历史文脉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而南京本土音乐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特殊的生态环境赋予了南京数量较多、内涵丰富、特色明显

的本土音乐文化遗存，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相继成为了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江苏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69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424项。其中，含和南京本土音乐相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如南京白局、古琴艺术（金陵琴派）；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项，如六合留左吹打乐、高淳民歌、南京评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项，如六合鲜花调、西善民歌，共计42项。但若结合省内外知名度进行考量，目前认知度较高的本土音乐体裁分别为秦淮区的南京白局和六合区的鲜花调。而这两种分属曲艺和民歌的不同体裁亦强烈显示出与南京文化生态环境的交互兼容性。

（一）南京白局

南京地区唯一的方言说唱曲艺，同时也是最早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白局，形成于元朝末期云锦织机房，是云锦工人闲暇生活中自娱的说唱方式。相传在过去表演时不取报酬，故有“白唱一局”的说法，因而得名“南京白局”。南京白局伴奏多采用江南丝竹乐器，因其说的是正宗的城南老南京话，唱的是明清俗曲和江南民调，表演内容涉及金陵美景、秦淮美食、历史传说、节庆民俗、方言俚语等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被誉为南京民间文化百科全书，对于研究南京人文风俗具有极大的历史贡献。在形式上，白局用纯正南京方言进行念白，同时配以极具特色的曲牌填词演唱，如《虞美人》《剪剪花》《满江红》《银柳丝》《梳妆台》《清板》《八板》《流水》《九连环》《滚板》等，曲调婉转动听，极富江南特色；白局的伴奏多采用江南丝竹乐器，如竹笛、三弦、二胡、琵琶等，再配上板鼓、碟盘、酒盅等特色打击道具，表演起来非常生动有趣；表演内容涉及金陵美景、秦淮美食、历史传说、节庆民俗、方言俚语等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被誉为南京民间文化百科全书，对于研究南京人文风俗具有极大的历史贡献。这其中，南京方言的运用是白局的一大特色。南京方言，在这里指的是南京城南地区的老话。而“南京城南”这一说法实际可追溯至明太祖时期，当时老城的南部以夫子庙为核心，东西至城墙，南至中华门，北至白下路，是南京居民最密集的地区，延续至今，称为“老城南”，包括南捕厅、牛市、老门东、老门西等著名地区。由白局艺术的历史可知，南京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白局的兴起与发展密不可分，两者共生互长。

（二）六合鲜花调

与南京白局不同，“鲜花调”归属民歌体裁，而它的重要流传地——六合，也独具文化生态特色。六合古称“棠邑”，别称“古棠”。古代六合的北部多丘陵山冈，南部是平缓的水乡圩区，但无论山区水乡，遍地生长着棠梨树、黄梨树，春天梨花盛开如雪。相传民间艺人李云龙祖父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早先有《十二红》，即一年十二个月，选一种红色花卉为歌唱内容。但在传承中丢失了《十二红》，演衍成以白色花卉为主的《鲜花调》，开头第一句唱词是“好一朵茉莉花”，接下来是“好一朵金银花”，“好一朵栀子花”等等。从地域分析，这与自然环境和民俗民风有关。

六合人偏爱梨花等白色花卉，是环境和地域涵养的心境使然，是该地域所特有的审美倾向。《茉莉花》是《鲜花调》母体中的第一节唱词，“茉莉”和“木梨”（六合称梨树的土语）属科相同，花形相似，谐音相近，这也许是《十二红》丢失，以茉莉花为首的白色花卉为歌咏内容的《鲜花调》得以流传的原因和根源。后来，相传1957年新四军文艺战士何仿将抗日战争时期在八百金牛地区采集到的《鲜花调》改词、加工，将《鲜花调》中其他花卉唱词舍弃，只保留第一节唱词“好一朵茉莉花”，原曲调未做大的改变，并定名为《茉莉花》。之后经修改后成为经典歌曲，享誉中外，传唱至今。《鲜花调》广传六合，有着明显的地域烙印。首先用词既有江淮的淡泊、简素、淳朴，也有江南的柔美、细腻、抒情；在语言上有很强的六合方言土音特点，如花（huo）、它（tuo）、骂（mo）等都是闭口音的韵辙。由此推断，因六合地区在中国历史上饱受战争和旱涝之灾，人们企盼和平与淡泊的生活，因此歌词选用茉莉花之类的平实花卉，也反映出本土人的心灵善良与诚实。通过爱花惜花，表露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向往和平幸福的心态。由上述分析可见，六合鲜花调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记忆，更与当地的自然、民俗、民风等和谐一体，不愧为六合特有文化生态环境下的产物。

与南京白局略有不同，既有对六合鲜花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曲调流变及其规律探寻，如《〈茉莉花〉曲调应用中的差异》（《乐府新声》2009年第2期）、《〈鲜花调〉的流变及其艺术价值》（《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泉港北管“唱曲”对【鲜花调】、【孟姜女调】的运用、变易及其规律性》（《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1期）。文中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六合鲜花调及其同宗曲调的前世今生加以了探究，对理清该体裁音乐形态（旋法、结构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结语

综上，选取南京本土音乐中认知度较高的南京白局和六合鲜花调，它们虽分属曲艺和民歌两类不同体裁，但综合源生地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等加以对比分析，均可显现与本地域文化生态的密切关联，本土音乐与当地文化生态可谓共根同生、互融相长。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无疑为我们探寻传统音乐文化（含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传承之路开拓了崭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许玮娟. 南京白局的生存现状与价值再生路径探究 [J]. 大众文艺, 2022 (07): 103-105
- [2] 陈苔. 美育教育与地方性传统艺术的交融性研究——以南京白局为例 [J]. 曲艺, 2023 (02): 59-63

本文为2022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非遗+”新业态下南京本土音乐的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22SJY0693）阶段性成果）